

【 建国以来唯一一部浙江新闻史 】

浙江新闻史

○ 王文科 张扣林 主编

ZHEJIANG NEWS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建国以来唯一一部浙江新闻史】

ZHEJIANG NEWS HISTORY

浙江新闻史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新闻史 / 王文科, 张扣林主编.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308-07937-2

I. ①浙… II. ①王… ②张… III. ①新闻事业史—
浙江省 IV. ①G219.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7858 号

浙江新闻史

王文科 张扣林 主编

责任编辑 李海燕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495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937-2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序

在浙江新闻史著作中,有两部影响较大:一部是临海报人项士元著《浙江新闻史》,1930年出版,约20万字,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新闻史专著之一。它记载并分析了从清末至民国早期的浙江新闻事业状况,下限为20世纪20年代。此书有一定的存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但毕竟成书时间距今已有八十多年。另一部是2007年出版的《浙江省新闻志》,约160万字,记述浙江省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时限为1854年至2000年(部分内容延至2003年)。它有丰富的、全面的史料,但毕竟是方志类史书,只能客观记载史实,不像专著或教材那样,有完整的理论架构和充分的论证空间。此外,浙江省的一些地区还出版了当地新闻史著作。所有这些,都为深入研究浙江新闻史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浙江新闻史》,是几位浙江学者和报人通力合作、深入研究的最新成果。它是一部力求契合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精神的著作。200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3次伟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在这三次革命的历程中,浙江新闻事业有何作为,如何做的,怎样与社会互动,自身有何发展变化,等等,都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围绕这三次革命评述浙江新闻事业的历史,成为本书的主线。

新闻史不是各类新闻传媒历史的凑合,也不是以历史为线索来串联各类新闻传媒,而是要将新闻事业产生与发展过程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分析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探索它自身的活动规律。因此,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和科学的理论架构。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将浙江新闻事业产生与发展衍变的历史划分为一些阶段,并据此安排各章、节、目的内容,结构合理,脉络清晰,符合历史发展逻辑。它是一幅构图美观、形象生动的画卷,而不是一堆孤立的、杂乱的材料。

浙江的新闻事业,是浙江一方水土的产物,是为本省服务的,但也有不少浙江的新闻媒体、新闻界人物、新闻事件与新闻报道,在全国有不小的影响,如宁波《中外新报》、秋瑾与《中国女报》、鲁迅与《越铎日报》、《非孝》事件、史量才遇刺事件,乃至《东南日报》等。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浙江向全国输送新闻专业人才,如流水不断。其中包括邵飘萍。他在金华为上海《申报》写稿,在杭州办报,再到北京办报、办新闻编译社、办新闻教育,影响全国,惠及后世。所以,本书问世也将为全国读者所欢迎。

明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本书出版格外有一份重要意义。

丁淦林

概 述

素称“文物之邦”的浙江,新闻事业源远流长。据有关资料考察,最早在唐代中叶,浙江极有可能已有“邸报”。到了南宋朝,临安的“小报”曾风行一时,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明清时期杭州等地,民间报房自购设备,雇工印售报纸,并逐步走向职业化。

浙江近现代新闻事业,其产生、演变和发展,从 1854 年宁波《中外新报》开端,至 2000 年已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据可查考的史料档案不完全统计,全省包括报刊、广播电视和通讯社,解放前后有过和现有各类新闻传播媒体总共超过 2200 种,其中报刊(不含非新闻性期刊)约 1500 家、广播电台(站)137 座、电视台 122 座、通讯社近 450 家。相当一部分报刊越省销行,有些报刊出过上海版、福建南平版,影响远及省外以至海外,尤其是浙江周边地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有新闻史学家指出,浙江新闻史可以说是我国东南新闻史。

发展轨迹

从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末,浙江的新闻事业经历了晚清、民国到新中国的不同时代,走过了漫长的和不平坦的路程。在近 150 年的发展道路上,有高潮也有低谷,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教训,从中显现出浙江新闻事业发展史的诸多特色。

浙江新闻事业起步早,是祖国大陆最先诞生近代报刊的三省市(粤、沪、浙)之一。早在 1854 年 5 月即有宁波《中外新报》面世,这就中文报刊而言,比上海的《六合丛谈》早两年零七个月。继之于 1870 年、1881 年,《宁波日报》和《甬报》创刊,1898 年又有《德商甬报》的出版。近代浙江最早的这几份报刊,之所以均

为驻甬外国传教士或商人所办,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并非没有来由。鸦片战争后,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宁波被列为“五口通商”的一个口岸,从此,打着布道传教和经商旗号的外国人接踵而至。这就是宁波《中外新报》等外报得以出现的历史背景。^① 驻甬外国人的办报活动,固然出于宣扬西方思想文化,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目的,但在曾是闭关锁国的中国毕竟开了风气之先,同时也启迪了国人的办报意识和欲望。在浙江,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发端于1897年,是年创办的有温州的《利济学堂报》和杭州的《经世报》、《杭报》。

广播电视业的起步,在浙江也比较早。据记载,我国政府自办的首座无线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电台诞生于1926年10月。接着的两年内,继天津、北京、沈阳广播电台开通之后,1928年10月,浙江省广播无线电台建成播音。浙江电视台开播于1960年10月,相距我国首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台前身)开始试播的时间不到两年半,离上海、哈尔滨电视台的开播则不到1年。我国的新闻通讯社始建于1904年,在20世纪20年代才有较大的发展,而浙江在1912年就建有民国新闻社。近年新兴的新闻网络建设,浙江的建站时间也在全国名列前茅。1999年元旦,浙江在线网站开通,它是国内新闻媒体中第一家超越报纸网络版,以独立新闻网站面目出现的网站。

近代以来的浙江新闻事业历史悠久,自清末到民国年间,在其发展进程中的第一次高潮是在辛亥革命时期。20世纪伊始,经遭八国联军的入侵,清王朝宣布实行“新政”,有限度地开放报禁。浙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开明进步人士,深知报刊宣传的巨大作用,便开始通过办报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和主张。伴随革命形势的高涨,在杭、宁、绍和金华等地,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急剧增多。《杭州白话报》发刊于1901年6月,原是一些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创办,不久即成为反清革命的舆论工具。1904年起,革命党人张恭等人主办的金华《萃新报》和宁波同盟会出刊的《武风鼓歙》,以及《绍兴公报》、《危言报》(杭州)、《善报》(嘉兴)等陆续创刊。杭州白话报馆总发行的《浙江潮》,1903年由浙江留日学生创办于东京,言论尖锐激烈,鼓吹革命甚力,在杭州各地影响很大。这一时期,清政府浙江当局和保皇派也以办报相对抗,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其他各类报刊,包括商报、学报和休闲小报。据现有资料显示,1901年至1911年的10年

^① 据《当代浙江简史·绪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

内,全省创办各类报刊约50家,相当于19世纪中后期46年所办报刊的4倍。1911年11月继武昌起义成功后杭州光复,这个月的18日,代表革命派利益的《汉民日报》创刊。邵振青(飘萍)受聘为主笔,连续发表评论揭露军阀阴谋,为维护共和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也因此而遭迫害。民国始建阶段,受辛亥革命胜利的鼓舞,全省报刊业仍呈发展趋势,仅民国元年(1912年)一年,先后创办的报刊就有30家左右,但在军阀统治下的报刊业,步履艰难,好景不长。1913年后的5年内,几乎没有新的期刊出版,新创办的报纸每年平均不到4家,其中部分报纸当年或次年即告停刊,《浙江民报》、《之江日报》也曾一度被军阀当局查封,还有几家报纸则自行撤并。

1919年至1935年,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再次出现高潮。这次高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创办的报刊数量大。16年间,全省创办报刊600余家,这在旧中国的浙江可谓报刊业鼎盛时期。此次发展高潮最初的标志是五四运动激活浙江报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众多报刊,包括《救国讲演周刊》、《浙江新潮》和《平湖日报》等进步报刊,犹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杭州工人办的《曲江工潮》也在这时出版。在此期间持续发展的报刊业,相当一部分是国民党各级党部及其政府机关报,同时也有中共组织所办报刊,绝大多数则为各界团体和民间同人办的报纸,如《浙江商报》、《中国儿童时报》、《浙江新闻》。其二,统一战线报刊活跃。1920年浙江各地的“民国日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多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产物。国民党省党部报纸《杭州民国日报》于1927年3月创刊,时任省党部宣传部长的中共党员宣中华兼该报社委主任,中共党员杨贤江出任主任编辑。同时创刊的《宁波民国日报》,也由中共党员担任编辑部和印刷所负责人。1924年创刊的《温州大公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县党部主办,初创时的两位编辑均为中共党员。其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报刊问世。继1919年出现《浙江新潮》、《钱江评论》之后,1921年2月,嘉兴《新滕半月刊》创刊,这都是浙江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几年,相继出版的《责任》、《少年新滕》、《觉悟》和《永嘉周刊》等,旗帜鲜明地阐发唯物史观和“列宁底精神”,宣传“反对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其四,新闻事业在完善其结构过程中迈开了一大步。此前,除在1912年建有家通讯社外,浙江新闻事业基本上是报刊业。截至1935年,全省曾经办过和继续在办的通讯社有100多家。起步于1928年的广播业,进入30年代也有较快的发展,1932年到1935年,省

内广播电台从原先的1座增加为17座。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中国，从此爆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在这祖国“最危险的时候”，浙江抗日救亡报刊风起云涌，新闻事业持续、迅猛发展。依照现存的史料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8年间，全省共创办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报刊约280家。仅1938年，就涌现出《战旗》、《啸报》、《怒吼》、《前线》、《抗日民报》、《抵抗日报》等80余家报刊。1939年1月，创刊于浙西前线的《民族日报》，为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出面创办，实则由中共浙西特委领导，共产党员王闻识任社长，记者、编辑多是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所办报纸富有战斗性、鼓动性，又有可读性，每期平均发行量近万份，曾在浙江战区产生较大影响。抗战开始不久，杭州失陷，《东南日报》、《正报》等一些报纸迁址金华，一批进步文化人士也来金办报出书刊。《浙江省新闻志》记述：“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在那里出版发行的报刊已有62种之多。金华成为全国抗日战争后方三大文化宣传中心之一。”^①1938年在金华出版的周刊《浙江潮》，名义上是国民党省政府主办，实际上由中共浙江省委文委掌控，严北溟为发行人兼主编，在婺共产党员骆耕漠、邵荃麟等人加盟编辑部。这份宣传团结抗日的进步刊物，抗战初期在全省影响很大甚至左右东南舆论。次年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身份视察金华时，曾单独约见严北溟作彻夜长谈，并就《浙江潮》进步倾向已遭国民党CC派忌恨如何应对面授机宜。战时金华出版并颇具影响的，还有《东南战线》、《青年团结》、《浙江妇女》等多种报刊。另在中共浙东、浙南、浙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办有《时事简讯》（后改《新浙东报》）、《战斗报》、《抗日报》。1944年创刊的《苏南报》于次年更名《苏浙日报》，为中共苏浙区委机关报，粟裕兼任社长，该报多次刊文阐明新四军抗战形势与任务，一时间在江南地区引起广泛反响。

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时期，一开始国民党抢占新闻阵地，创刊和复刊一些报纸，由金华回迁杭州的《东南日报》还出了上海版。此后民办的报纸和通讯社一度发展较快，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这些报纸很大一部分都在当年或次年停刊，民办通讯社短期内停业的更是不少，即使勉强维持不倒，正常发稿的不足三分之一。当时，国民党系统报纸控制误导舆论，以图转移人民群众的

^① 杜加星主编：引自《浙江省新闻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满情绪。与之针锋相对,1947年5月,中共浙南特委在瑞安山区创办《浙南周报》。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1948年至1949年初,中共四明、浙东、金萧等地区工(临)委,在各革命根据地办起《四明简讯》、《浙东简讯》、《金萧报》和《新路南报》等8家报纸。纵观这个时期,处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心腹地带的浙江,在一段时间里,新闻事业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低潮。从1948年后期开始,社会日益动乱,市场物价飞涨,报纸出版每况愈下,且多已处于停刊半停刊状态。解放前夕,全省的报纸仅20余家,其中大半集中在杭州。

历史转折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胜利的红旗旋即飘扬全省,接着又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人民政权的建立,新中国的诞生,开创了浙江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是浙江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重大转折,崭新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从此崛起,并沿着既定方向迈开前进的步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浙江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以党委机关报为主轴发展起来的。

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于1949年5月9日创刊,这是浙江新闻史上第一张公开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省级报纸。同一天和5月26日,新华通讯社浙江分社、浙江新华广播电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开始发稿或播音。新中国成立前后,宁波、丽水、金华、衢州地区党委机关报创刊发行,温州地区党报则在原中共浙南特委于1947年创办的《浙南周报》基础上正式出版,《工人生活》、《杭州公安》等家报纸也在此期间亮相。50年代头几年,又有台州地委机关报和《农民大众》以及几家专业报发刊。进入50年代中期,浙江的经济得到恢复,社会渐趋稳定,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又使得人们思想活跃。正是处于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为适应当时农业合作化的新形势,浙江新闻事业建设有个大发展,主要的标志是县一级出现办报办广播高潮。继省内最早的县委机关报《临海报》、《萧山报》于1954年创刊,1955年尤其是在1956年,《慈溪报》、《富阳报》、《武义报》、《江山报》等县级党报脱颖而出。据《浙江省情概要》统计,到了1956年底,全省当时81个县共有县报75家。在各个地区,除已有的党报外,杭州和嘉兴、建德、舟山地区党报均于1955年创刊,至此,以《浙

江日报》为龙头,在全省范围初步构成省、地(市)、县3级党委机关报网络。此外,《广播周报》、《浙江交通报》和《浙江青年报》都在这两年内出版。浙江解放初期,各县即建广播收音站,1951年与1953年,临海县城关镇、永登县分别建起省内第一座城镇和县广播站。1955年到1956年,各地普遍兴建县级广播站,特别是大办农村广播。1960年底,全省基本实现广播“村村通”。也就在50年代,温州、宁波、舟山、杭州4个地区,先后建立广播电台,另在城乡大中型企业和高等院校,大多办有有线广播站。但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先是由于经济困难和其他原因,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由高潮跌至低谷。各地县报到1961年全部停办,有的地区党报和省里的工人报、青年报也告休刊。10年“文化大革命”,全省报业更是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最后仅存《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农村科技报》3家,而喧嚣一时的是一些“文革小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浙江政治和经济形势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随之焕发生机,很快在全省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的建设高潮,进而走向浙江新闻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

在浙江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建设的新高潮中,突出的表现是报业的复兴和发展,在重建和健全省、市(地)、县三级党报网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党报为核心的门类齐全和多层次的报业体系。这一期间,原已停刊的宁、温、金、嘉、衢、台、丽和舟山地区党报,除《舟山日报》在1979年10月复刊外,均于1980年至1986年间重新出版,湖州、绍兴地区党报,则于80年代初期创刊。至此,全省11个地区都办有市(地)委机关报(《杭州日报》在“文革”中曾停刊3个月)。此前早已停办的各县委机关报,也在80年代主要是在90年代先后复刊。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各种综合性报纸和专业报异军突起,新创办的有《经济生活报》、《联谊报》、《浙江法制报》、《浙江经济报》、《浙江教育报》、《浙江市场导报》等省级报纸,还有各地区的广播电视报和几家侨乡报纸,连同复刊的原有报纸共约50家。其中,《今日早报》、《都市快报》、《温州时报》等,时称“都市报”,风行市场;晚报和下午版报纸的出版,则使全省社会主义报业结构更趋完善。解放后浙江第一家晚报《钱江晚报》于1987年元月在杭创刊,杭州以外的各个地区接着也创办晚报,还有《杭州日报下午版》,1993年冬发刊。此外,许多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和政府部门也在这期间纷纷办报。截至2000年,经过报业整顿,适当控制量的扩张,着力提高总体水平,全省有全国刊号公开发行的各类报纸

总数为 95 家,包括各级党报 41 家、综合性报纸 9 家、专业报 37 家、晚报和下午版报纸 8 家,加上各单位(部门)主办的各种各样内刊(报型:内部资料),据不完全统计,总共在 250 家以上。

浙江报业的复兴和发展,随着报纸种类和数量激增,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技术现代化步伐加快。过去在计划经济年代,作为报社主要经济来源的广告业一向滞后,“文革”期间报纸广告近乎绝迹,办报全靠政府全额拨款或补贴。改革开放初期,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各报开始经营工商广告业务,经济收入连年增多,从而改变“办报靠拨款”的被动局面并自给有余。到 90 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由于新闻改革的深入,报纸内容日益丰富,发行量大幅攀升,更是推动广告业和其他经营活动的大发展,各报经济收入普遍快速增长,2000 年全省报业广告创收达 10.75 亿元。在此基础上,各级党报和其他多家报社都盖起新闻大楼,并为全面更新办报印报设施准备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原先报纸均为铅字手工排版,老式轮转机或平板机印刷。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省、市(地)级党报和部分县报,以及颇具经济实力的专业报,相继进行了两次印刷“技术革命”。第一次是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即将报纸铅字排版改为激光照排,以现代化胶印替代铅印,用轮转机出版彩色报纸。第二次是以采、编、排全程电脑化为目标,做到报纸稿件编审程序“无纸化”即电脑操作,也就是从写稿、编辑、审定到报纸排印,整个生产流程基本达到网络无缝对接的要求。《浙江日报》的照排系统,印刷能力在全国省级党报中领先,2000 年底,该报引进当今世界先进印刷技术 CTP,投入运作后可以用计算机直接制版,省去出胶片和拼版、晒版等工序,既缩短了出报时间,套色精确度也大大提高。

在改革开放时期新闻事业建设新高潮中,全省广播电视业与报业齐头并进,不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数量迅猛发展,而且较快地实现高覆盖率和多功能开发。1983 年,中共中央批转广播电视部 37 号文件,明确提出中央、省、市、县“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改革事业建设指导方针。浙江贯彻落实这一方针,除杭、宁、温 and 舟山地区于 50 年代已建设广播电台外,其余 7 个地区均在 80 年代中期和 90 年代建台播音,全省县级广播站也在此期间普遍改建为广播电台。浙江山地与丘陵占陆地面积的 70%,不适宜无线广播的大功率覆盖,各地按照省里的计划部署,统一执行大中小功率并举,以中小功率地波覆盖为主的技术政策,因地制宜兴办中波广播转播台,逐步在全省建起中波广

播发射(转播)网络,有效地扩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台节目的覆盖范围。各地原已建成开通的农村有线广播网,80年代经整顿、巩固和改善网络技术设施,致力于广播传输的标准化建设。随后又推行有线广播与有线电视共缆传输入户。到20世纪末,一个以乡镇广播站为基础的有线共缆传输系统已在省内初步建成。浙江电视事业虽起步于60年,但此后的20年间,仍是浙江电视台一枝独秀。在八九十年代。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省、市(地)、县各级纷起兴建电视台。据截至90年代中期统计(不含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内部电视台),全省建有无线和有线电视台共124座,其中省台3座、市(地)台19座、县台102座。以后,为进一步改善广播电视业的管理,各县电视台、有线台与广播电台合并成广播电视台,对外仍保留各台呼号。

全省广播电台、电视台在新时期逐渐星罗棋布,广播电视技术也在与时俱进,尤其是节目信号传输技术,由电缆、调频等演进为微波、卫星、光缆传输,节目传输质量和覆盖能力随之不断提升。1986年至90年代初,省内已建3条广播电视专用微波干线、16个微波站,各市(地)还建起通往所辖县、区的微波支线。紧接着,全省推广建设卫星地面接收站,利用卫星传输收转中央电视台和电大节目,1994年元旦,省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建成并投入运行,遂将浙江电视台1套和省电台2套节目送上卫星,节目信号可以覆盖全省乃至全国及周边4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人口。90年代中期,从省、市(地)、县到乡镇的光缆大联网建设告竣,进而形成天上卫星传送与地面有线传播的星网结构,并成为全省广播电视传输覆盖新型模式和发展趋势。省、市(地)级广播电台、电视台还本着“新闻立台”理念,积极开发传播信息、宣传教育、提供娱乐和服务受众等多种功能,挖掘潜力,设置经济、文艺、体育、交通、健康等专业台(频道),以适应社会各界新的需要。省台和一些市(地)台开办的广播或电视交通台(频道)与交警部门合作,抢在第一时间播报交通信息,深受听众观众关注,收听收视率很高。“西湖之声”广播电台凸显娱乐台特色,较早实行主持人主持直播,并开通热线与听众互动,1992年开播后,收听率居当地各家电台之最,“西湖之声现象”风靡杭城。

亮点多多

历经晚清、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2000年,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河里,浙江许多开拓性、首创性并在省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传媒史事,以及新闻界和政界、文化界、教育界浙籍名人的办报业绩,闪烁着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个亮点。这里所要记述的,虽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由此可见一斑。闪光的历史精华是弥足珍贵的财富,以史为鉴,发扬光大,将使浙江新闻界在党的领导下,越发信心百倍地去开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更美好的明天。

浙江早期的一批近代报刊当中,有两种别具特色的专业期刊,就是《算学报》和《史学报》。《算学报》发刊于1897年7月,黄庆澄创办,以介绍和普及数学知识为主要内容,是全国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可谓中国数学杂志的鼻祖。《中国数学史简编》称,我国最早的数学期刊是1900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外算报》,其实,温州《算学报》的创刊比它早了3年,该报封面标有“光绪丁酉开报”字样,清光绪丁酉年即1897年。馆址始设温州府前街,第2期起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办分馆,从此即在上海出版发行,销路颇好,流传较广。1901年(一说1906年)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合编本,刊载它与各地交换的报刊目录,其中就有《算学报》。该报创刊第二年,受戊戌政变牵连而停刊,出刊时间虽短,但影响深远。《算学报》“对促进算学的研究、培养算学的新人,以及对后来温州成为‘数学家之乡’,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①。1899年,黄庆澄又在温州创办《史学报》,它是《算学报》停刊后出现的另一种专业性月刊,内容包括中国史、西洋史、日本史。据现有史料判断,《史学报》当为我国最早一份史学刊物。

20世纪开元前后,白话报刊的兴起,对推动辛亥革命功不可没,就报刊语体而言,改文言文为畅达通俗的白话文,则有其划时代意义。早期白话报刊遍及浙东北,其创刊之早、数量之多,在全国是十分突出的。这不仅是浙江新闻事业发展历史中的一个亮点,也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光彩的一页。白话报刊发端于戊戌维新时期,当时全国计有5种,包括《平湖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以上海

^① 引自潘猛补:《清末温州三刊物》,载《鹿城文史资料》。

《演义白话报》创刊最早。^①《演义白话报》1897年11月份创刊,而另据记载,^②《平湖白话报》也在这一年出版,可惜具体出版时间不详。辛亥革命时期,白话报刊在全国有较快发展,浙江新创办的有《绍兴白话报》、《宁波白话报》、《湖州白话报》、《南浔白话报》、《白话新报》和《浙江白话报》。全国宣传反清革命的白话报刊,有一部份由原来支持维新改良转变而来,1901年创刊的《杭州白话报》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该报由支持改良转为倡言革命,关键是孙翼中的加入。1903年孙翼中接任经理兼主笔,不久参加光复会,报馆成了光复会秘密联络点,报纸也就成了革命党的舆论工具。《杭州白话报》到1906年才停刊,是辛亥报坛全国影响较大、出刊时间最长的白话报。我国的少年儿童报纸,最早也是在浙江出现的,那就是《中国儿童时报》。原名《儿童时报》,1930年6月创刊于绍兴,次年秋迁址杭州时更名,并向全国发行。当时国内还没有专供儿童阅读的报纸,《中国儿童时报》出刊,连边远省、市都有订户,甚至日本、朝鲜、暹罗及南洋等地不少华侨儿童也汇款订购。该报发刊词中申明宗旨是“培养社会儿童与科学儿童相结合的新中国儿童”,抗日战争时期又补充“抗建儿童”。该报不仅是给儿童在学校“坐而读”,而且要让儿童到社会上“起而行”。在抗战时期为激发儿童爱国热情,报社曾组织抗建儿童团,向抗日前线归来的战士致慰问词、送慰劳品。《中国儿童时报》也有过坎坷的经历,迁杭后曾多次受到当局警告,命其在有关报道中要对某些进步人士贴上“逆”字标签,由于从未照办,报社召开理事会,常有警员“旁听”监视。1931年秋,抗日名将吉鸿昌被迫辞职,该报以醒目标题刊出消息,时任省教育厅长的陈布雷看了以后,即在报纸上批注数行,责问报社是何用意,声称将禁止发行。后经托人疏通,始得幸免于难。

广播事业作为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后在浙江发展较快,特别是农村广播网的建设在全国名列前茅。毛泽东主席与浙江农村广播,曾经有过一段不解之缘,至今传为佳话。1954年春,毛主席视察浙江期间,从杭州驱车直奔新登农村,在松溪桥头下车步行2里多路,来到松溪乡王家水礁村,与农业社员亲切交谈,调查了解合作社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在这里听到了新登县的农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项士元:《浙江新闻史》,之江日报社1930年版。

村广播,赞许有加,兴奋不已。毛主席对秘书田家英说,要将发展农村广播这一条写进“农业发展纲要”。1956年1月,中央经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讨论修改,《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内容,由27条扩充为40条。扩充的部分,就有发展农村广播这一条,即《纲要》第30条。原文是:“(三十)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各乡和大型的农业、林业、渔业、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都装置收听有线广播或者无线广播的工具。”《纲要》的公布,对全国发展农业生产是极大的鼓舞和促进,同时也调动起各地发展农村广播的积极性。浙江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0年全省基本上实现有线广播“村村通”,提前达到《纲要》提出的目标。此前于5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1956年,各县普遍建有面向农村的广播站。县广播站除主要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台节目外,设有颇具乡土特色的自办节目,包括本地新闻、农业技术讲座和小故事、小演唱,深受农民群众的喜爱。

浙江的报纸和广播电视,时有业务和技术上的开拓创新,其中多项堪称“全国第一”。1854年创刊的《中外新报》,作为浙江第一份近代报刊,也是省内最早的铅印报刊,而且在全国最早使用“元宝架”排字。这种元宝式字架,显著提高排字效率,半个多世纪一直被各地报刊沿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激发新闻工作者的智慧和胆略,影响较大的创新项目不下15项。^①椒江广播站在广播中,率先推出“请”、“谢谢”、“再见”等礼貌用语,对此《中国广播》曾以《良言一句暖三冬》为题刊发推介文章。萧山广播机构开发成功“有线广播多通道、多功能传输”装置,一对广播专线能同时传送4套节目、发挥7种功能。这一“萧山经验”旋即引起国家广电部门重视并向全国推广。《杭州日报下午版》通过当地联机服务网络传输,拉开了中国报纸电子化序幕。实行“双休日”制不久,浙江电视台首创周末版节目,受到观众的支持和欢迎,从此开办周末版在全国电视界渐成风气。浙江电台“交通之声”是我国第一个经批准的全省调频同步广播,其调频广播同步覆盖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在广播业务层面取得突破性成就。该交通专业频道1998年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合作开播,一开播就力求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报道交通服务大众”,全天节目线性安排、动态

^① 杜加星主编:《浙江省新闻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播出,遇有突发事件即时应急直播,几年来广受好评,声名鹊起,成为浙江一个知名的广播品牌,常有省内外同行前来考察交流。

这里还应当特别叙及的是,诚如项士元在1930年版《浙江新闻史》中说的:“凡海内所有国人编刊发行之新闻纸,浙江省人士,鲜不参与,此诚中国新闻史之光荣,亦浙省文化之卓可称述者也。”尤其是新闻界和政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浙籍名人,他们在省内外从事报刊活动的卓著业绩,为浙江和全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国新闻界名重史册的浙籍人士,首推一代报人邵飘萍(东阳人)。邵飘萍成为全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生涯是从杭州《汉民日报》开始的。在他主持该报笔政近两年间,高扬民主革命旗帜,撰发论说、时评、随笔等90余篇,同封建军阀官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到上海,在多家报纸上撰文声讨袁世凯,旋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员,连续发表“北京特别通讯”,揭露抨击北洋军阀。1918年创办《京报》,编撰大量通讯报道和评论,痛斥军阀卖国罪行。他还是五四运动以及五卅运动、三一八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此前后,著书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协助党刊《向导》、《政治生活》的出版。在办《京报》期间,参与创建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大新闻研究会,应聘担任导师,并著有《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1926年4月,被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罪名杀害。邵飘萍为民主革命战斗的一生和献身精神,他在新闻战线的卓越成就,永久地为后辈所景仰和怀念。

清末民初,杭辛斋(海宁人)也是有名的报人。早年在天津参与创办《国闻报》,在北京任《中华报》社长兼总编辑,并曾创办《京话日报》。1908年在杭先办《农工杂志》,再办《白话新报》,办报思想由维新转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受当局所托创办《汉民日报》,延请邵飘萍为主笔。《汉民日报》被封前,他赴京任职,再重返天津,主办反袁报纸《民声报》。后曾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在新闻界,曹聚仁、查良镛(金庸)、赵超构等驰名的浙籍人士,在民国年间和解放后,分别在沪、港等地的新闻岗位上均多有建树。

余杭人章太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又是辛亥报坛的先驱者之一。1897年初他应邀赴沪,为《时务报》撰述,同年返杭参与创办《经世报》并任编撰,此后,几乎毕生投身报刊活动。他从结识孙中山起,政治上转为革命派,曾为多家报刊撰文或任主笔、编辑。1903年在上海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出版